

一 清末政府对外交涉重臣

唐绍仪从 1881 年美国留学归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 30 年内，一直在晚清政府为官。他由一个品级低微的一般涉外官吏，迁升侍郎、尚书、以至封疆大吏和对外交涉大臣，升迁速度颇快。其中，机遇固然不可缺少，但他自己也确具出类拔萃的学识、胆略及才干。

1. 随驻朝鲜崭露头角

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始于 1393 年(明洪武二十六年)，止于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历时 500 余载。其间，每当朝鲜新王即位，即由中国皇帝谥号前王，册封新王。朝鲜奉中国为正朔，定期纳贡，并于节庆日期遣使祝贺。朝鲜对中国的这种“以小事大”的封建宗藩关系，到唐绍仪被派赴朝，开始他政治生涯之时，仍然没有改变。

不过，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大清帝国自身已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遂使日本势力乘机侵入朝鲜，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便日趋恶化。1882 年 7 月，汉城士兵因不满日本的侵略和本国政府的扣发军饷而举行了起义，史称“壬午兵变”。兵变发生后，朝鲜政府立即向宗主国清政府发出了请兵弹压的要求。清

政府从巩固中朝宗藩关系和防止日本借事要挟出发，决定出兵，并于同年 8 月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淮军统领吴长庆、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袁世凯等率军舰 3 艘、士兵 3000 名入朝，镇压了这次起义。此后，清军便留驻朝鲜，帮助朝鲜政府整顿，训练军队。

1884 年 4 月，法国将侵略的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境，清政府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加强边防。李鸿章立即奏调吴长庆带兵 3 营离朝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命袁世凯总理留朝的 3 营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这一年确是多事之秋，朝鲜的政局也并不稳定。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日本以“壬午兵变”中使馆被焚，日本人被杀为借口，迫使朝鲜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即《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依据这两个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朝鲜的大量赔款和增开通商口岸，还可以在朝鲜驻屯军队，日本外交官及其家属也可以在朝鲜自由旅行等等。这样日本的势力便得以进一步向朝鲜渗透。另一方面，朝鲜政府内部，由金玉均等青年官僚组成的开化党，正在加强与日本勾结，准备发动政变，脱离中国而“自主”。一场新的变乱正在酝酿之中，而朝鲜政府和驻朝清军对此并未察觉。

同年 12 月 4 日，金玉均等在日本配合下发动了政变。他们进入王宫，控制了国王李熙，矫诏处死了倾向中国的大臣，并改组了政府。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政变”。袁世凯于夜间获悉政变的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电告李鸿章，同时，也率兵出动，准备镇压。途中，他听说亲华的朝鲜大臣闵泳翊在政变中受伤未死，逃出后已被家人送到税务司穆麟德（德国人）宅中救治。为了进一步了解政变的情况，他率兵先奔穆宅。在穆宅门前微弱的灯光下，他看到了一个身材伟岸的青年。此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见他带兵骤至，立即上前盘问。后经交谈，才知都是自己人。原来此人名叫唐绍仪，是清政府派到朝鲜的帮办税务委员。

唐绍仪，字少川，是广东香山人士。他的童年时代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提倡洋务运动以自强之时。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唐绍仪是1874年随清廷所派第三批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当时他年仅14岁。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度过了7年的学习时光，最后在耶鲁大学文科毕业。7年的海外留学不算短暂，对他思想的形成及他的政治生涯的影响都相当大。1881年，他奉召回国后，先被安排在天津水师继续学习，转年，李鸿章推荐前驻天津的德国领事穆麟德去朝鲜襄助海关事务，他便被荐担任穆麟德的秘书，随同赴朝，帮设海关。

“甲申政变”发生后，闵泳翊身带剑伤逃到穆宅避难。唐绍仪适时正在穆宅，他惟恐开化党人尾随追杀灭口，便主动持枪到门外护卫。这就表现了唐绍仪具有在政治斗争中所必须具备的机智和勇敢。袁世凯对唐绍仪这一极不寻常的表现，钦佩不已，他感到唐绍仪这个青年，可是个智勇兼备的难得人才。

袁世凯了解了政变的经过后，意识到事态已相当严重，如让亲日的开化党人掌握了政权，朝鲜必然会脱离中国，依附日本；他自己准备在朝鲜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志向和愿望，也将随之而破灭。既然前景是如此的灰暗，倒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主意拿定后，袁世凯立即率领大队清军和他训练的两营朝鲜亲军向王宫奔去。支持政变的日军见大队清兵赶到，急忙开枪射击，袁世凯也下令清军还击，双方展开了枪战。激战一阵后，日军因人数较少支持不住，日本公使竹添只好率日军撤离王宫，随后又自焚了使馆，与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乘船逃往仁川。朝鲜王李熙在袁世凯的拥护下，下诏重组了政府，恢复了原来的秩序。短命的“甲申政变”便至此终结。

显而易见，代表清政府的袁世凯成了这次事变中的胜利者。他

本想抓住这个时机，加紧控制朝鲜，使自己在仕途上再高升一步，然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和乐观。日本公使竹添兵败回国之后，不仅推卸自己的罪责，还诬蔑清政府和朝鲜人民如何仇恨日本。于是，原本想借开化党政变驱逐清朝势力，扶植自己势力，以扩大对朝鲜侵略的日本政府，就势利用了竹添的报告，大肆进行歪曲宣传，煽动日本朝野的反清情绪。结果，有的政府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清廷宣战，一些团体也在上野公园举行“膺惩清国大会”，有的团体甚至还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与法国联合进攻中国。反清气焰一时甚嚣尘上。同时，日本政府还将罪责转嫁给朝鲜政府，并派遣日军侵入汉城，又以使馆被焚、日本人被杀等借口，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有道歉、赔款、惩凶、重建日本使馆和兵营等内容的《汉城条约》，达到了扩大侵略朝鲜的目的。由于这个《汉城条约》并未解决中日军队的冲突问题，日本政府又扬言还要同中国进行谈判，要求清军退出朝鲜。

1885年3月，日本伊藤博文一行来华解决中日军队在朝鲜的冲突和撤兵问题。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谈判。4月，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均不派员训练朝鲜军队；今后朝鲜如有变乱重大事件，派兵去朝要互相照会，事定即撤，不再留防。伊藤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坚决不接受，最后为了敷衍日本人，李鸿章答应以私人名义警告责备袁世凯。

当日本扬言要清军撤出朝鲜之时，袁世凯也感到了事态发展的不妙，愤慨之余即以养母有病为名，请假回国。《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去朝鲜了，便心灰意懒地在家闲住起来。但是，他没有料到就在这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形势又发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

朝鲜公使韦贝不断进行活动，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府在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已成惊弓之鸟，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利益冲突的加剧深感焦虑不安，惟恐中日决裂危及朝鲜。在税务司穆麟德的策划下，便有暗结北方的俄国为后援之意，并与俄国订立了“第一次俄韩密约”。朝鲜政府这种“联俄拒清”政策，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为了维护中朝的宗藩关系，李鸿章决定起用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准备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担任驻朝鲜商务委员。为了使袁世凯到朝鲜后，不仅仅单纯照料商务，还能从政治外交等方面控制朝鲜政府。李鸿章还向朝廷建议提高袁世凯的权限。于是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最后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1月13日，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再赴朝鲜上任，在汉城设立了公署，还特别挑选了原在穆麟德属下工作的唐绍仪做他的随员和西文翻译。由此这两个教养和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开始了他们政治上的合作，他们不久在私人关系上又义结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

唐绍仪从大洋彼岸学成归国，面临的仍然是一个讲究家族名望与传统功名，惟科举是正途的封建时代，留洋资历在当时还不是仕途高升的有利资本。但是，他于偶然中结识了袁世凯并受到袁的赏识，而他自己又具备精明的头脑和出色的才干，于是任职朝鲜便成了他政治上崭露头角的重要阶段。他随同袁世凯上任后很快成了袁世凯把持朝鲜局势，维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得力助手。当袁需要与西方国家驻朝使节及各界人士进行交涉时，他也都给予了有效的合作。

“甲申政变”失败后，亲日的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逃亡日本，于1885年秋想通过日本旧自由党的政客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动员武装日本浪人侵入朝鲜，事前于大阪被揭发而失败。但此事不仅对朝鲜刺激很大，袁世凯也深恐金玉均与日本勾结不利

于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因此全力支持朝鲜应付可能的变局，并策划暗杀金玉均。中朝双方约定各选派一个勇谋兼备者一同前往。中方人选很快确定，唐绍仪不畏艰险，勇于前往。袁世凯写给总署的报告说，唐绍仪娴习洋务，胆识俱优，慎密老成，能胜任这一派遣。后来这一密谋由于朝鲜方面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未能成行。

1885年2月底，清政府获悉了英国为了与俄国抗衡将占领朝鲜巨文岛的传闻，但是李鸿章当时认为英国占据此岛是为了对付俄国，与朝鲜、中国没有什么损害，所以未予关注。同年4月15日，英国亚洲舰队突然占领巨文岛。由于巨文岛地处朝鲜海峡的门户，扼守俄国东洋舰队行驶的要道，俄国立即采取了反击措施，一方面向朝鲜政府声明英国的行动不能容忍，另一方面以它将占据朝鲜领土为威胁对中国施加压力。加上朝鲜政府也一再抗议英国侵占其领土，清政府才在外交上展开了劝英国撤出巨文岛的攻势。1886年春，唐绍仪也参与了这一涉及中朝俄英的交涉。最后俄国同意口头保证决不占领朝鲜领土，清政府将俄国的承诺转告了英国，英国便于1887年2月撤出巨文岛。

在巨文岛事件后，唐绍仪还在阻止韩俄结盟，阻止朴定阳使美等交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才能，维护了清政府对朝鲜的宗藩关系。因而深受袁世凯的倚重并成了袁的主要助手。1889年10月，袁世凯写报告上呈李鸿章，报告中称赞唐绍仪优有胆略，明敏谄练，要求李鸿章委任唐绍仪兼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汉城领事。从此唐绍仪便以袁世凯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同步晋升的机遇。

根据1882年清韩所定《中韩水陆通商章程》，中国所派商务委员前往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唐绍仪兼任龙山商务委员后，忠于职守，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处理了一件伤害华商

的积案。这一案件的大致情况是：寓居朝鲜的华商所开设的“三合兴”各商号的房屋财货，先后被人放火焚毁，这些商号的华人伙计也惨遭杀害，但此案很长时间一直未能破获，一些善后事宜也就耽搁下来。唐绍仪认为如此对待很不应该。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并上报总署（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一，朝鲜外署应限期严缉各案人犯，一定要拿获法办；第二，在未破案前，先行设法赔偿各商号被焚资本，酌量抚恤死者家属，以示体恤。很明显，唐绍仪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积极而妥善的。虽然他是上任伊始，但已显露出精明与干练。

1890年7月，汉城发生了一起韩商排挤华商的“撤栈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有背景的。根据清韩所订的《中韩水陆通商章程》，华商在韩可享受一些特权，如缴纳低于其他国家商人的关税，可自由在韩国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等等。久而久之，首都汉城的经商权便为华商所垄断。朝鲜官商对此极为不满，便在背后唆使韩商闭市数日，企图挤迫华商迁往距汉城5公里的龙山，使华商不能再与韩商9厘分利。由于有韩王密令，韩商便无所顾忌，地方官也放任不管。唐绍仪对这一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了上呈总署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事件的原委做了极为明了透彻的分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后经总署对韩责斥，这一事件才获得解决。

1891年8月6日夜，龙山分署的巡差发现了一个未领执照的华工趁着朦胧夜色进入了俄国使馆。他便跟着前往查看，使馆人员加以阻止，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事后俄国公使向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提出交涉，抗议华捕擅入俄国使馆查询华工。袁世凯因事出龙山，谕令唐绍仪查办。唐绍仪根据清韩所定《中韩水陆通商章程》中，凡来韩华民均须到分署领取执照，以便稽查以及无论在何处雇工，均须托取保人赴分署领取执照，违者查办

等条款，在给俄公使的复文中坚持原则，据理辩驳说：华捕查传未领执照之华工，系巡差应行之事，只是未携本府文件入使馆，有所不妥，已对其进行责斥，贵公使也应告诫该华工前来申领执照。俄国公使对唐绍仪这种软中带硬，转守为攻的复文十分不满，又提出了正式照会。照会中指责唐绍仪未先通知俄公使和获得允准，便派巡捕前来使馆传带华工的做法不仅违犯万国公法，也违反日常礼仪。进而还狂妄声称该华工应归俄使馆保护管辖，于其本国应行各事一概免除，其本国官员也无权干涉。就在俄公使气焰嚣张之时，唐绍仪于 12 日采取了强硬措施，押禁了依恃俄使馆袒护，对《章程》明知故犯的华工高阿成，同时函告俄国使馆。俄公使对唐绍仪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甚至不怕事态升级的断然措施，甚感意外，遂于 13 日再次照会说：要求立即释放该华工，否则后果自负。同时还以要将此案详报本国政府暨驻北京公使相威胁。唐绍仪丝毫不为俄公使的恐吓所动，坦然答复说：拘禁违犯令章的华工高阿成是无可非议的事，贵使欲如何对待和处置，完全是贵使自己的事，只是贵使干涉中国官员审办案件之权，有碍本署国体权利之事，我也不得不详请我国政府核办。事态至此，僵持不下。直至 25 日由于广帮怡泰号具保，唐绍仪便释放了高阿成，并为其补发了执照。事件到此应算了结，但俄公使觉得丢了面子，不肯就此罢休，便直接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并于 11 月 7 日派翻译官向唐绍仪提出“送文赔礼”的要求，而且送文内还要声明，已从严惩处了进入俄使馆的巡差和在市上拿获未领执照的华工违反了公法等等。唐绍仪坚持原则，据理驳辩说：惩戒巡差之事，我已按要求办了，并已面告公使。至于送文一事，未奉我政府命令，不便擅送。此外，再次重申：在市上拿获未领执照之华工，完全是身为中国理事官本人的应有之权利，没有任何违反公法之处。由于唐绍仪态度强硬、义正词严，俄公使无懈可击，

以再加驳辩，遂使此案拖延，使俄公使成骑虎难下之势。后因俄国还需清政府维持列强在朝鲜的“均势”不宜将关系搞僵，俄公使便亲自到唐绍仪公署与唐握手言和。此案最后以俄方妥协而结束。唐绍仪于朝鲜折服俄公使，不仅表现了他不屈不挠的交涉风格和斗争艺术，而且为清政府保护自己的领事裁判权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1891年10月袁世凯请假回籍探亲，上书李鸿章，请求由唐绍仪代理自己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职务。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确能胜任代理。李鸿章致总署的咨文也说：唐绍仪忠直明敏，前出洋学习10年，在韩襄事又10年，熟悉洋务交涉及韩人情形，完全可以委令暂行代理。于是袁世凯兼程回籍，后因母死服丧，又续假百日，唐绍仪总共代理袁的职务有7个多月时间。这期间唐绍仪为报答袁的知遇之恩，对所代职务堪称竭尽忠智，恪尽职守。

控制朝鲜海关是清政府维护和加强对朝鲜宗藩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袁世凯和唐绍仪对此都相当重视。但随着民族意识的加强，朝鲜对清政府的控制日益不满，遂有乘袁世凯回国度假之机，谋取海关独立的活动，拟在清政府已选派洋人充任税务司的仁川、釜山、元山三口岸之外，再增开新口岸，以便自行聘人管理。唐绍仪觉察这一情况后立即与朝鲜驳辩，坚持另开口岸必须由中国派用洋人，不得自行雇用他人，而且均须遵照仁川、釜山、元山三口岸的规定办理。在唐绍仪的抵制下，朝鲜谋取海关独立的活动失败。

清政府为了维持“上国”尊严和宗藩关系，是不赞成朝鲜直接派遣使臣出国开展外交活动的。1887年8月，朝鲜国王李熙为了寻求新的保护，竟然不顾袁世凯的阻挠，断然派遣朴定阳出使美国，这对代表宗主国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朴定阳

回国后，袁世凯为了以示惩戒，就逼迫李熙撤朴定阳的职，并声明永不委以外交职务。当时李熙被逼无奈，只好照办。袁世凯回国度假后，朝鲜政府便想乘机起用朴定阳，唐绍仪针对这一情况立即向朝鲜政府指出，这是有意尝试为“朴定阳使美”翻案。为了加强在外交上控制朝鲜，他强行阻止了朝鲜政府的这种“尝试”。

清政府做为宗主国，对本国商民在韩权益历来维护。前文已述 1890 年 7 月汉城曾发生排挤华商“撤栈”事件，后经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韩责斥，乃告解决。袁世凯归国度假后，汉城再次出现试图抵制华商的事件。汉城府少府李建易违背《中韩水陆通商章程》中华商有权于该城购赁房舍的规定，出告示禁止韩人卖屋于华商。后在唐绍仪的干涉下，这一禁令最后被撤销。

唐绍仪代理袁世凯职务期间，继承了袁对朝鲜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几乎无干涉，这无疑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封建压迫。但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时代，维护清韩宗属关系，在客观上对延缓列强在朝鲜的扩张是有利的，从而也就有利于延缓列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唐绍仪这一时期在朝鲜的作为，正是清政府对韩政策和在韩利益的具体表现。因此，李鸿章对唐绍仪颇为赏识，称赞他所办之事足存体制，并在 1892 年 7 月奏奖驻韩人员时，除按常例请给唐绍仪候选知府、加三品衔的官衔之外，还奏请给予三品封典。

1892 年 5 月袁世凯销假返回朝鲜，这时，正值朝鲜因财政紊乱，宫廷糜费无度而准备以电政权举借外债。久欲扩大侵略朝鲜的俄国与日本乘机从经济上向朝鲜渗透。俄国计划从俄境海参崴铺设铁道到韩境元山。日本也准备包办由釜山至汉城的电线。唐绍仪对此反对的相当激烈，坚持电政是中国主权，不允分割。袁世凯回韩后完全支持唐绍仪的主张，终使俄国与日本的企图未能

实现。为了不使国库空虚的朝鲜再以电政、关税去向其他国家抵押借债，袁世凯、唐绍仪便委托旅韩的粤商同泰顺承办借款 20 余万给朝鲜，以后再由朝鲜关税中分年偿还本利。朝鲜政府接受了贷款，清韩关系也略有改善。

这个时期朝鲜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财政紊乱和国库空虚，政治的腐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也都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斗争，到 1894 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农民起义。面对陡然爆发、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一时慌了手脚，朝鲜国王便急电清政府代为“戡乱”。袁世凯也电请清政府发兵朝鲜，平复乱众。日本、俄国也积极插手朝鲜内政，意欲使朝鲜成为他们的“保护国”。尤其是军人阶层在国内掌权的日本，野心更大。自 1872 年西乡隆盛提出“征韩论”以来，一直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其实质就是伺机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

袁世凯为向清政府请兵，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对形势做了十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倘若日本也出兵的话，至多是借保护使馆的名义，派百余名士兵到汉城来，不至于有大举动。李鸿章考虑后也觉有理，便接受了袁世凯的意见。1894 年 6 月 4 日，李鸿章派兵 1500 名，驰往汉城。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殊不知，还在 1894 年 5 月底，日本政府就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了。6 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又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密令。当日本接到中国出兵照会后，窃窃私喜并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6 月 9 日，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悍然率“护卫队”800 人强入汉城。日本海军陆战队 8000 人随后陆续在仁川登陆，并向汉城挺进。朝鲜半岛局势急遽恶化。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起义，毫

无对日作战的思想准备。而日本却是有备而来，四处布兵。等待与华寻衅。袁世凯见形势急转直下，立即电告李鸿章，要求调动海军入朝对日本示以声威。但李鸿章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出面“调停”。袁世凯无奈，只好奉行李鸿章的妥协路线，遂使日本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而袁世凯多年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之间便瓦解了。

看到日本人控制着朝鲜政局，袁世凯感到大势已去。敌众我寡，难以动作。此时他只想一走了之，以摆脱自己在朝鲜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艰险境况。6月29日，袁世凯连发三封电报向李鸿章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为耻辱，我在此也很难见人，应该下旗回国。同时，他还说，准备以唐绍仪为留守，看管公署，注视事态发展。由于李鸿章仍寄希望于俄国调停，便回电说：俄国政府已几次谕令它的公使调停，一定会有结果的。你暂且忍耐，事态必有转折。并诫勉袁世凯：要坚贞，不要怯退。但是，袁世凯对此已不抱希望了，他深知自己如不尽快脱身，必有性命危险。因为东学道起义爆发后，一部分起义者就想刺杀他，吓得他不敢出公署大门一步，公署等于被禁困。等日军大举入韩，东学道义军虽已敛迹，但朝鲜的亲日派却对他怀有旧恨，并准备清算，而日本也正欲借朝鲜人之手把他除掉，遂使他日夜惶恐不安。面对越来越迫近的危险，袁世凯决心脱逃，就在李鸿章来电让他不要怯退的同一天，他置冒犯李鸿章于不顾，再发一电，陈述了自己目前窘迫的处境，渲染了自己纵然一死也于事无补的痛楚。由于李仍未允诺，7月14日，袁世凯又发电恳求，言称自己身患重病已不能理事，政务已交唐绍仪代理。此外，对唐绍仪做了恰如其分的推荐，称赞唐绍仪智略不凡，明了事理，更具备应变之才，与韩国外署和西方国家驻韩公署也都熟悉，由他接手一定不会贻误大事。

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电报哀求下，李鸿章终于被打动了。7月17日，李鸿章奏明朝廷后，奉旨调袁世凯回国，以唐绍仪代办一切。当托辞患病，躺倒不干的袁世凯接到准他调回的电报后，一跃而起，匆忙化装易服，准备出逃。唐绍仪则全副武装掩护他安全离开汉城，到仁川搭乘“平远舰”返回天津。袁世凯在朝鲜12年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但中国和朝鲜面临危机却毫无改变。这时，已到了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夜。

唐绍仪接替袁世凯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实，在清政府还没有下达正式委任之前，唐绍仪已毅然代替躺倒不干的袁世凯肩负重担了。当时，朝鲜形势日益严重，驻韩公署要随时把情况报告国内。从7月14日起，国内收到的电报就已由唐绍仪署名拍发了。唐绍仪接任后，继续在公署向李鸿章和总署通报朝鲜局势，一直坚持到7月22日，即日军进攻中国驻韩公署的前一天。

日军得到袁世凯登舰离韩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了军舰火速追击，必欲杀袁而后快。但追了一程又一程，仍不见“平远舰”踪影，只好转舵而还。7月23日，日军围攻朝鲜王宫。同日，为发泄对袁世凯的仇恨，也攻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为免遭日本人俘获之辱，及时从后院脱身，到英国总领事署暂避，他与国内联系就此中断。直到一个多星期后的7月31日，清政府才从欧洲驻华使节处获得唐绍仪在英国驻韩总领事署避难的确切消息。8月1日，唐绍仪又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至仁川搭乘德国轮船抵达烟台。8月4日，他再乘船赴天津述职，结束了代理袁世凯担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职务。不过，他与袁世凯不同，他在朝鲜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

1895年4月，日本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偃旗息鼓。这场战争使中国元气大伤，辽东半岛尸横遍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4月17日，李鸿章到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

关条约》，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独立自主”，昔日清政府在韩的地位，完全被日本所取代。这时，清韩之间由于过去所订的旧章约已无效，新章约尚未签订，因而清政府不便派遣官员驻扎朝鲜。但为了商务需要和尽量维持清朝在韩的特殊政治地位，也不能无人在韩。为此，袁世凯建议选派一个熟悉朝鲜情形的官员，以商董的名义去朝鲜首都，明可维持商务，暗可随时探报朝鲜内情及各国在韩动态。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人选方面自然选中了随袁驻韩 12 年，一度代理交涉通商事宜，表现不凡，经验丰富的唐绍仪。于是，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唐绍仪即以“朝鲜通商各口岸华民总商董”的名义，再度前往朝鲜。

对于原来做为“宗主国”的清政府来说，虽然被迫在中日《马关条约》中承认了朝鲜的“独立自主”，但它并没有就此放下宗主国的架子，视朝鲜为平等国家，也不准备与朝鲜建国与国之间应有的外交关系。朝鲜方面则截然相反，作为过去地位低微的“藩属国”，迫切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签订平等条约，因为这样才能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唐绍仪此次到朝鲜，虽然不代表清政府与韩接触，但却执行着清政府不与韩建立正常关系的特殊使命，以此阻滞朝鲜“独立自主”的进程，维持清朝曾为上国的尊严和体面。所以这个时期唐绍仪在朝鲜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立约与派使问题，巧妙地与韩周旋。

1896 年 5 月，朝鲜为了了解清政府对立约派使问题的态度，指派其华语翻译朴台荣对唐绍仪进行探询。唐绍仪当即答复说：韩王不堪日本威逼曾于 1895 年冬逃入俄国使馆，要求保护，这件事说明，朝鲜还不能称为独立国家，既无独立之权，就不能派使。如果韩方执意向中国派使，中国将不以礼相待。

时隔不久，朝鲜政府又派其官员赵秉稷前往唐绍仪处探讨立约问题，唐绍仪仍严词拒绝说：中国虽在《马关条约》中声明朝

鲜自主，但条约中并没有要与朝鲜订约的文字，所谓“自主”，不过是不再执行清韩旧章而已。如果互换条约，就是把朝鲜视为平等之国，这两件事是迥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唐绍仪虽然拒绝了朝鲜方面提出的派使、立约的要求，但是自知这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寻求一个与韩订立贸易章程的变通办法，不但于国际公法说不过去，而且遇到事关双方的交涉事件，也确实很难办理。所以他在拒绝韩方要求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考虑和建议向总署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认为朝鲜是中国数百年的藩属，过去当然不能与它订立平等条约。现在虽已承认它独立自主，但却仅见于中日条约。鉴于这种情况不如参照公法，仿效英德两国派遣总领事驻扎朝鲜京城，这样做既可打消韩王执意要求派使之心，又可避免其他国家以此煽惑，还可使日后的中韩交涉有所遵循。总署研究后，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但从维护中国的体面出发，强调应坚持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的原则。同时，准备委任唐绍仪担任驻韩总领事。

1896年10月26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了对唐绍仪的委任，使唐绍仪在朝鲜有了正式的官方身份和职权。但是，唐绍仪在朝鲜的艰难处境，却并未由此好转。原因是甲午战争后清韩关系发生了变化。朝鲜方面极力表现“独立自主”，诸如拆毁“迎恩门”（即迎接中国使节之门），改建“独立门”在清帝后万寿节的祝词中称中国为贵国，称韩王为我大君主等等，不胜枚举，所以遇有交涉事件也就远不如战前好办了。仅就订立税则改修章程而言，过去双方交涉易于达成协议，而此时朝鲜官员桀骜不驯者多，又有其他国家在后唆使，遂使谈判很难取得进展。再有，总领事的委派并没有熄灭韩王的派使之心和订约之念。尽管每次提出都遭到唐绍仪的驳斥，韩方仍然无止无休，老调重弹。日、美等国又以中韩之间没有条约，唆使朝鲜政府取消华租界，凡此种种都使唐

绍仪感到十分难办。

唐绍仪虽然身处既不受韩方尊重，又遭其他国家驻韩使臣排挤的逆境之中，但是他作为清政府驻韩总领事的气节并未因此而衰。他仍然尽心竭力地维护清朝的尊严与体制，保护在韩华侨的切身权益不受侵害。尤其是他对日本无理勒逼中国赔偿甲午战争期间在仁川失踪的日商船只及所载货物一案的处理，更能显示他的气魄和才干。此案发生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韩的华电局根据“定雇民船通例”，扣留了一只违例运输船的橹舵，但日本领事照会声称，这只船是日本商人雇的，于是华电局又将橹舵发还船主。战后，日本政府以这条船在战争期间于仁川失踪，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索赔。唐绍仪奉命调查后严正指出：战争爆发前，华电局已将橹舵发还了船主，这只船的下落已与华员无关。战争爆发后，华员撤退，一切事务均由英国驻汉城总领事及仁川领事代办，更无向中国追究的理由。至于船上所载货物，应是船主负责照看，况且发还橹舵时并未提出有所遗失，现在，向中国提出赔偿要求，于情理于条例，都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唐绍仪的报告有理、有据、有力，总署便据此照会日本公使，拒绝了日方的无理勒索。唐绍仪对此案的处理堪称果断严明，一反鸦片战争以来，凡与洋人交涉总是屈辱妥协退让的前例。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朝鲜自主和派遣使臣驻扎汉城，朝鲜欲与原来的宗主国清朝订约、派使的要求也就日益强烈。此时，清政府也感到总是一成不变地严加拒绝，也未必就是上策。于是总署着手准备在对韩政策上有所变通，作出一定的让步。1898年5月21日，总署指示唐绍仪：如果朝鲜仍坚持要求派使，可在商谈中明示准其派遣四等公使，由总署与其议通商约章。朝鲜方面获悉了清政府拟与其建立正常关系的决定后十分高兴。唐绍仪接到谕令后，感到有所不妥，遂复电总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

为不便由朝鲜先派使臣到京索取条约，因为这是关系到体制的大事。不如由中国派遣四等公使前往与朝鲜酌议商约，以表示朝廷给予旧藩属的恩惠待遇。总署听取了唐绍仪的意见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改变了由朝鲜派使来京的决定，而由清政府派遣四等使臣前去朝鲜办理。

朝鲜方面本来对清政府准备与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定是十分满意的，赶紧拟好国书并准备派外署的沈相薰赴北京呈递。等到清政府改变了建交程序后，便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不满，指责中国的反复有“以大蔑小”之意并与唐绍仪发生了争辩。唐绍仪则以不知出于何人之意相推搪，并坚持朝谕已定不能再行改变的立场。1898年6月26日，清政府委任安徽按察使徐寿朋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任驻朝鲜四等公使。至此甲午战争后不正常的中韩关系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98年8月29日，唐绍仪接到家乡来电，9月12日离开朝鲜回原籍奔丧。由此结束了他在朝鲜16年的政治生涯。1882年11月，他初到朝鲜之时，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九品小吏和默默无闻的随员，而离开朝鲜之时，已是官至三品的候选知府和朝野人士所瞩目的外交新秀了。在朝鲜任职的漫长岁月，他经历了几多风雨，付出了几多艰辛，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涉外工作经验，培养了坚定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意识，这些都为他后来的迅速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二度附袁再展才华

唐绍仪归国时，袁世凯已在距天津东南方向70余里的小站编练新军了，职务为新建陆军督办。这支新建陆军，便是后来北洋军的老底。袁世凯没有忘记这个在朝鲜对他有救命之恩的昔日同